

傳世智慧

讀

呂氏

春秋

編纂●呂不韋
譯著●梁一群

上

開
智
慧

亂世中的處世智慧，
流傳兩千多年以來，
首次以白話完整呈現……

智慧大學

UNIVERSITY OF WISDOM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讀《呂氏春秋》開智慧／呂不韋編纂；梁一群譯著．

-- 初版．-- 臺北市：智慧大學，2002〔民91〕

冊： 公分．--（傳世智慧：5-6）

ISBN 957-452-324-1（上冊：平裝）．--

ISBN 957-452-325-X（下冊：平裝）

1. 呂氏春秋—註釋

121.871

91014680

傳世智慧 ⑤

讀《呂氏春秋》開智慧(上)

NT\$199

梁一群／譯著

2002年11月／初版

出版者：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

編輯部／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21巷11號3F

電話／(02) 2230-0545 * 傳真(02)2230-6118 * 郵撥 19533805

總管理處／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（東南學院正對面）

電話／(02) 2664-2511 * 傳真(02) 2662-4655 / 2664-8448

網址／<http://www.linyu.com.tw>

E-mail／linyu@linyu.com.tw

總經銷：吳氏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-1號5樓

訂書專線 (02) 3234-0036 * 傳真(02) 3234-0037-8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-452-324-1

傳世智慧

讀

呂氏

春秋

編纂●呂不韋
譯著●梁一群

上

開
智
慧

亂世中的處世智慧，
流傳兩千多年以來，
首次以白話完整呈現……

智慧大學

UNIVERSITY OF WISDOM

讀 呂氏 春秋 開 智慧

本書簡介

讀《呂氏春秋》開智慧

呂不韋本來是戰國時代的一個生意人，後來竟然官拜秦國的丞相，可見其智謀的高深，並膽識過人，獨具慧眼，還有精準無比的經營活動力。

《呂氏春秋》在當時是一部容納各方飽學之士的大作品，完成之際即在咸陽城門公之於衆，並向天下人挑戰：有誰能夠增減一字者賞給千金！結果沒有人領到「一字千金」的大獎。足見這部吐納百川，兼收各家的典籍有其無比的魅力。《呂氏春秋》是一部注重經世實用精神的作品，在21世紀的今天，我們仍可在字裡行間發現其擁有無窮的爆發力！

超特價

199元

ISBN 957-452-324-1



9 789574 523245

00199

呂不韋〔編纂〕
梁一群〔譯著〕

讀《呂氏春秋》開智慧（上）

目

錄

導 讀 / 6

第一章 孟春・仲春・季春 / 17

第二章 孟夏・仲夏・季夏 / 67

第三章 孟秋・仲秋・季秋 / 125

第四章 孟冬・仲冬・季冬 / 191

第五章 有始・孝行 / 241

第六章 愼大・先識 / 271



導 讀

一

《呂氏春秋》是一部雜家之作。

從先秦到西漢之初，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一段「諸子百家」蜂起競作的歷史。這是後世的著述家極為欣羨的時期。當然，「諸子百家」之稱，不過概列其大數而已。根據撰寫《漢書》的班固之說，其實是「儒、道、陰陽、法、名、墨、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」這十大家。這十家中除了雜家，可以說無不各具其思想特色，甚至有的還截然相反，針鋒相對。雜家之「雜」，看來像是其他各家學說的某種匯集。然而它竟也自成一家，入居「諸子十家」之列，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多投以幾許目光。

雜家的來路，據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，是「出於議官」。議官，即後世所謂「言官」、「諫官」，是縱論朝政之得失，以備諮詢和拾遺補闕之需。如此而

言，則其不外乎趨於經世實用一路。因此，班固又說它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」就是指明其「路數」。

雜糅諸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說，與其說是純學術之必然，不如說是現實政治所需。而《呂氏春秋》一書更因托蔭於秦相呂不韋名下，明顯有此傾向。呂不韋在戰國後期，真可謂是一時的風雲人物：他從經商到從政，屢發屢中，無往不勝，直至位居秦相，號曰「仲父」，天下諸侯幾乎無不仰其鼻息而趨奔不暇。然而，不數年間，卻又被逐出政治舞台，然後是一再貶謫，最終飲鴆自盡，身敗名裂。而操縱其事的便是後來以「秦始皇」之名列於史傳的那位秦國國君。

二

關於呂不韋的傳奇式故事，載於《戰國策·秦策五》以及太史公所撰《史記》中的《呂不韋傳》等處。據記載，呂不韋此人似乎是個經營有方的大贏家——至少在他最終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之前是如此。

呂不韋起先因專事「買賤賣貴」活動而致富。在此之後，他開始從事新的冒險事業：經營政治。事情從他在當時的趙國都城邯鄲見到子楚時開始。



子楚（《戰國策》作「異人」）是秦國送到趙國的「質子」，也就是人質。子楚在秦國，雖然名為國君的兒孫，卻只是太子安國君二十幾個兒子中很不起眼的一個。他的生母夏姬也不為安國君所寵幸。正因如此，子楚雖然被當作表示秦國決無侵犯趙國之意的承諾——以國君的兒孫作為「質子」，送到趙國，而秦國侵犯趙國的事件卻幾乎沒有中斷過。也因為這樣，子楚在趙國的日子可實在不好過，備遭冷落。

呂不韋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獨到的眼力，以及他傑出的經營活動能力。據說他在邯鄲見到處於困頓而不得志的子楚，就認識到：「此奇貨可居。」又據說他馬上回家同父親相商。不韋問其父：「耕田之利幾倍？」其父答說：「十倍。」再問：「經營珠玉買賣呢？」「百倍。」又問：「擁立一國之君呢？」回答是：「無數倍。」呂不韋當即做出如下判斷：「現今即使努力耕作，也不能得多少贏餘之利，而建國立君則可得世代之益，這是值得做的買賣。」

呂不韋的這一決斷，日後將被證明不僅對於他個人，而且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，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。在與子楚這一「奇貨」做了某種「交易」之後，通過積極而有效的幕後活動，當然還輔之以大量金錢——呂不韋正好擁有這種資源——子楚得到了安國君所寵幸的華陽夫人的信任，被立為安國君的嫡嗣，也就是

其政治地位的繼承人。

不數年間，秦昭王、安國君（即孝文王）相繼去世。此時，已經回到秦國的子楚就順理成章，當上了秦國國君，是為秦莊襄王。莊襄王任呂不韋為丞相，封為文信侯，封邑在河南雒陽，有十萬戶。過了三年，公元前二四六年，莊襄王去世，年僅十歲的嬴政即位，呂不韋被尊為相國，號「仲父」。事實上，自此之後，直到秦王政九年（前二三八年），嬴政親政之前，呂不韋是秦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角。

雖然有關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這一問題的討論，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，但是，至少就呂不韋這一事例而言，有關的事實使我們有理由認為：這種作用的力量，肯定是遠遠超過那些對此抱冷漠態度者的想像。且不說其它，單看呂不韋所造就的兩個事實：《呂氏春秋》的編纂傳世，秦王政——後來被稱為秦始皇——的上台，就不能歸之為「換了另外一個人也會這樣做」了。

三

關於《呂氏春秋》一書，還有一個頗具戲劇性的事件：此書完稿後，即在秦都咸陽城門公之於眾，並且向天下諸侯、遊士、賓客發出



咄咄逼人的挑戰：有誰能夠增損此書一字的，賞給千金。結果是無人敢於出面應戰。這在今日，怕是要被看作頗具「廣告效應」的事吧！而作為一個商人，呂不韋也應該是熟諳此道的。不過，此事另有原因在，為的並非推銷其著作。

據太史公的說法，當時諸侯各國爭相招攬士人，多以其言論學說動海內。尤其是「荀卿之徒，著書布天下」的情形，使得呂不韋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，厚遇之」，於是「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」，輯集成這部《呂氏春秋》。如此看來，那「二字千金」之舉，還含有向天下人示威自傲之意。漢代高誘以為當時無人前去增減一字，是畏懼呂不韋的勢焰，這實在是片面之見。

《呂氏春秋》的具體撰述者，後人大約是永不可得知了。班固說它是「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」。但是，以經商起家的呂不韋究竟在學術研究活動中有何造詣，則不得而聞。想必至多不過是「在政治上把把關」罷了。不過，以其書編纂的初衷而言，能夠在政治上通過審定，應該算是大功告成。蓋因為其書本非遵循學問之道而為，只求其實際功效而已。

當然，也不能因此而認為《呂氏春秋》只講實際操作，不講理論。相反，它在當時被認為是「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」，是在自覺地構造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系統。構造一個理論體系，這在西方的傳統裡是大學問家的事，例如古希臘那位差

不多早於呂不韋一百年的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。然而在中國，歷來本無「為學術而學術」之事、之人。因此，這類工作就由政治機構出面，招集一幫文人來做。這樣的結果，就難免安上一個「雜」字。

說到底，《呂氏春秋》一書實在是「議官」們縱論天地萬物，乃至人倫等方面的內容，以備國家機器之需的一部大作。

不過，這裡不能與後世「議官」的活動相提並論。後世的論者是在一個大框架基本定形，甚至已經被設定得巨細靡遺的情形下從事其活動的，而在戰國末年，乃至西漢之初，一切都還有待於創設，雖然朦朧之中已有大致的方向。相對說來，撰寫《呂氏春秋》的那批智略之士施展的天地就寬裕多了。這是其後兩千多年中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。難怪明代大儒方孝孺在《讀〈呂氏春秋〉》中有如下感嘆：「世之謂嚴酷者，必曰秦法，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，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，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，若是者，皆後世之所甚諱，而秦不以罪。嗚呼！然則秦法猶寬也。」

方孝孺為之感慨不已的情形，在《呂氏春秋》一書各部分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，而這在當時似乎也算不了什麼罪過。這種現象大約與秦國歷來的氣度、作風有關。秦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，一直



被認為是偏荒之邦，算不得文明國度。然而，這個秦國卻也正好少有歷史包袱。它倒是天生就善於吸收、拿來，不拘一格，務求實效。譬如說，秦打天下，用的就不僅是本國的力量，而實際上是天下的力量。所謂：「太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即其寫照。這種氣度、作風延伸到有關構造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時，就出現《呂氏春秋》這樣的雜家巨著，看來也是毫不足奇的。

但是，同樣可以說，這種秦人務求實效的精神如果貫徹到底，則也是可以隨時捨棄，至少是不顧任何觀念形態或什麼體系的。並且，它會因此而躊躇再三或反覆思量什麼。後來秦王政剪除呂不韋的政治力量，整個過程非常乾脆利落，不幾年工夫，世上就彷彿從來沒有過呂不韋其人似的，整個秦國的國家機器則一如既往，按照它的既定方針而運行——這一事件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：產生這樣一部雜家之作的現實土壤，在不費吹灰之力傾覆參與這一精神構造活動的實體時，具有何等懾人的力量。

四

在當時的各諸侯國中間，秦國也許是最缺乏思辨精神的。然而，秦有一部

《呂氏春秋》。秦有一部《呂氏春秋》，它當然是吐納百川，兼收各家的，而非單造獨創。單造獨創，雖被一般人視為天機在手而匠心自運，其實乃是思辨精神從現實束縛中擺脫出來，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所造就的結果。簡單說來，就是以懷疑的精神、批判的態度，重新構築這個世界，而不是那種準備隨時做出迎合現實——人們因為感到無法從它那裡引出合乎理性的說明，故而只能承認它是不可捉摸的，有某種神祕的背景——的解釋。當然，在這裡不能用任何一種預先設定的標準，譬如說，以古希臘學術的特點為標準，衡量《呂氏春秋》。那樣的話，將會使我們對它做出不恰當的評價。另一方面，把它說成是一部「綜合百家」之作，恐怕也是有欠慎重的一廂情願之辭。

「綜合」云云，不能看作是哪種輯集的成品，而應該視之為某種學術探究的結果。《呂氏春秋》是出於政治之需要而兼收並蓄先秦諸家學說的。這樣的兼收並蓄，其取捨的標準並不是學術性的，而是政治性的。這一點不可不明。不能否認此書各篇有些是具有相當水平的，不過，總體上看，則是學術性的要求讓位於政治性的要求了。因此，《呂氏春秋》一書即使有「綜合」的實績，那也應該以政治學說史的範圍為界限，過此則為大謬。



中國傳統的實用政治學說，如同其它各學科一樣，從未獲得一個獨立的學科地位，也同樣被裹於一個所謂的「天地人」無所不包的大體系當中。因此，我們現在看《呂氏春秋》，也須從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」等名目看起。太史公說此書是「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」，不假。不過，它決非學術上通過批判性的清理基點，從而在此基點上構建一個世界觀的結果。毋寧說，《呂氏春秋》一書各篇之間雖然多有雜揉互滲之處，而其大旨則是以「為經世實用而學術」的精神，對諸家學說做了一番取捨揚抑。而其雜揉互滲的現象之所以未能得水乳交融之效，原因也正在於它的這一精神的真正貫徹。

這部產生於秦國的雜家之作確是稍微顯得粗糙了點。這可能正是秦人過於注重經世實用的精神所致。《呂氏春秋》一書的價值也許正在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例：有著追求經世實用之傳統的人是如何擁有他們的世界觀念。當然，與後世的作為相比較，這裡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，而且它也許還被那些更務於實用的實際活動家看作是無關緊要之物：隨手可棄。秦人後來統一中國，就無所謂是信奉和運用了何種學說的結果。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過程也並非訴諸某種深思熟慮的籌劃，而更像是一系列隨機碰撞，同時不斷做出適宜之反應的結果。這種情形既造就了秦人的勝利，也導致了他們的覆滅。其理由就是這種情形曾經

使得人們確信，既然能夠於馬上得天下，當然也同樣能夠於馬上治天下。直至到了漢代，而且還是在幾經探討和思索之後，人們才了解，僅有此種世俗的實用精神是不敷使用的，還必須具有某種較為穩定之觀念形態的存在物。不過，那已經是到了產生《淮南鴻烈》和《春秋繁露》的年代了。

五

《呂氏春秋》一書當然可以有種種讀法。不同的讀者，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，根據自身的條件，按自己的方式閱讀此書。本書不打算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和評判《呂氏春秋》，只是擷取其較有代表性的片言隻語，用現代人的語言，對之做一二發揮。目的當然不是要苛求古人，或為古人諱，而只在於為有意者提供古今思維方式異同之處的一二實例，以及對待這種現象的各種視點。老實說，從思維習慣看，幾千年來，我們中國人還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的。因此，鑑古知今，仍有其需要。

對於我們中華文化的了解，我們自己還是遠遠做得不夠的。而不了解自身，實在是當今人類的一大問題。直到二十世紀末，人們已經越來越感到認識人類自身的迫切性，以為捨此便不能再取得人類文明

